

編號：第 789/2010-II 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 A (A) 及

B (B)

日期：2012 年 7 月 26 日

主要法律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調查原則及發現事實真相原則
- 無效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罪疑從無原則

摘 要

1. 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亦未發現存在漏洞，故此，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a) 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2. 具體分析相關證據，原審法院除在審判聽證中聽取兩名上訴人的聲明外，還聽取了輔助人的聲明及相關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電話通訊記錄文件及其他書證、扣押物證及其他證據後，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一項信任之濫用罪的事實做出判斷。

除了審查相關書證外，原審法院還對兩名上訴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人格及其行為進行分析，從而決定是否採信該等陳述和證言，並結合一般經驗法則，可合理且顯而易見地得出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實施了犯罪行為並無明顯的、即使是普通人亦可輕易察覺的錯誤。

3. 對於有關條文規定無效屬取決於爭辯之無效，利害關係人必須在法定期間內對有關無效事宜提出爭辯，否則，有關無效將獲得補正。根據上述規定，上訴人所提出的問題應該在聽證階段中調查證據結束後即時提出爭辯，又或在原審法院訂定宣判日期批示作出通知後十日內提出爭辯。

本文中並無任何跡象存在上訴人所述之非法賭博，原審法院並未違反調查原則及發現事實真相原則。

4. 在賠償判決方面，上訴人曾向法院申請調查證據，亦曾向法院提交證據，原審法院對其提交的證據進行了調查和審查，由此可見，原審法院並未違反辯論原則。

在本文中，上訴人在其提交的答辯狀中指出輔助人違反了司法保密義務，就輔助人之行為是否觸犯《刑法典》第 335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並不是原審法院在本文中審理的問題。

5. 原審法院判決中作出分析說明，雖然其肯定了賭場行內借貸程序的慣常做法，但同時亦根據證人的證言認定由於輔助人與 Y 貴賓廳老闆之間的熟悉關係，輔助人不需跟慣常做法借貸，因此，之間的做法有所不同，兩者之間並無矛盾之處。

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未經法院認定的事實以及作出的

理由說明，上訴人所指的矛盾並不存在。

6. 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卷宗內亦不存有可導致無罪釋放上訴人的“合理懷疑”，故此，原審法院未違反上訴人所指的罪疑存無原則。

裁判書製作人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 789/2010-II 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A) 及
B (B)

日期：2012 年 7 月 26 日

一、案情敘述

於 2010 年 9 月 10 日，上訴人 A 及 B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 CR3-09-0230-PCC 號卷宗內均被裁定觸犯一項《刑法典》第 199 條第 1 款及第 4 款 b) 項，結合第 196 條 b) 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信任之濫用罪，各被判處四年三個月實質徒刑。

上訴人 A 及 B 被判處賠償受害人的財產損失，賠償金額港幣 53,819,640 圓，扣減扣押的籌碼以及港幣現金；扣減後之金額附加利息，以法定利率、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直至完全繳付賠償。

上訴人 A 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既證事實沒有符合信任之濫用罪的構成要件

1. 既證事實沒有清楚交待 C 將港幣 53819640 圓交給兩名嫌犯的原因，可以理解為 C 將港幣 53819640 圓交給兩名嫌犯，

可以理解為 C 將港幣 53819640 圓借給受害人 D，可以理解為 C 將港幣 53819640 圓借給受害人 X 貴賓廳也可以有其他的理解。

2. 既證事實第二嫌犯 B 在 X 貴賓廳幫忙跑腿，負責招待賭客及送交款項的工作，不是幫 D 工作的。
3. 於案發日，兩名嫌犯是幫 X 貴賓廳到 Y 貴賓會提取相關的款項，而不是幫 D 到 Y 貴賓會提取相關的款項。
4. 這樣，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便不可能將涉及的款項判給輔助人 D 作為損害賠償。
5. 換言之，既證事實中沒有指出 D 和 Y 貴賓廳之間的法律關係，沒有交待 Y 貴賓廳是基於什麼法律關係將上述款項交給兩名嫌犯，因此不能說 D 是上述款項的債務人，而 Y 貴賓廳是上述款項的債權人。
6. 既證事實中僅指出 D 通知兩名通宵工作的嫌犯去 Y 貴賓廳提取一筆款項，但沒有交待兩名嫌犯接受前述之任務，亦沒有交待兩名嫌犯在 Y 貴賓廳提款時，表明是幫 D 提款的，故此，兩名嫌犯出現在 Y 貴賓廳可以是幫 D 提款，也可以是為自己提款。
7. 考慮到嫌犯 B、證人 F 和 G 通宵在金沙娛樂場陪客賭錢，上訴人、輔助人和前述三名人士通宵以電話聯絡，以及輔助人和 C 之間從來沒有以電話聯絡的背景，認定輔助人要求兩名嫌犯幫他到 Y 貴賓廳提款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情，相信兩名嫌犯當時是在為自己提款較為符合案發當時的背景，這一相信亦符合經驗法則。
8. 基於上述之可能性，上訴人有可能將自己的錢據為己有，

又有可以將 D 的錢據為己有，或者其他原因將錢據為己有，由於既證事實欠缺了指出港幣 53819640 圓屬於誰所擁有的這一重要事實，繼而沒有指出上訴人將屬於受害人的港幣 53819640 圓據為己有，這樣便欠缺了一個構成信用之濫用罪之要件，請求上訴法院開釋上訴人被判處的加重信用之濫用罪，因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錯誤適用澳門刑法典第 199 條第 1 款、第 4 款 b)項和第 196 條 b)項，前述之理由說明源自中級法院刑事上訴卷宗第 152/2006 號表決聲明。

被上訴之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之明顯錯誤瑕疵

9. 既證事實中的客觀犯罪要素指兩名嫌犯拿取了 X 貴賓廳的相關款項，主觀犯罪要素指兩名嫌犯的行為使 D 蒙受金錢損失，由於 X 貴賓廳是由多名股東合資經營，其中包括 D，故 X 貴賓廳的經營股東和 D 是兩個不同的個體，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未有區分這一點，沾有審查證據方面之明顯錯誤瑕疵。
10. 編號 Log56878 及 04-02-09 之錄影光碟的內容完全可以將“兩名嫌犯是去九樓協助輔助人 D 將港幣 53819640 圓的現金和籌碼運送到八樓”這一事實推翻，亦推翻了既證事實內的大部份事實，因為光碟反映出來的事實如下：
包括 Y 貴賓廳帳房人員將涉及的款項交給一名叫阿權的人士、兩名嫌犯在 Y 貴賓廳內行錯路、Y 貴賓廳的兩名司機 F 和 G 帶同款項連同兩名嫌犯一進入電梯內便直落酒店地下、裝住相關款項的行李箱一直由 G 保管、四位人士沒有去位於同一酒店八樓 X 貴賓廳的意圖。

11. 被上訴的法庭忽略了編號 Log56878 及 04-02-09 之錄影光碟的內容，繼而認定判決書內的既證事實，故被上訴的裁判沾有審查證據方面之明顯錯誤瑕疵。
12. 載於卷宗 909 至 911 頁之 Y 博彩中介人一人有限公司之商業登記證明，顯示該公司的唯一股東是 H 先生，行政管理亦屬於 H 先生，公司由 H 先生一人簽名有效。
13. C 無法如其他帳房員工一樣出示皇冠酒店發出的員工證，認定 C 是 Y 貴賓廳的負責人時，被上訴之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之明顯錯誤瑕疵。
14. CY002326 號借款單僅能證明輔助人向 Z 國際借取港幣伍仟萬圓正，而不能證明輔助人向 Y 貴賓廳借取港幣 5000 萬圓，然而被上訴法庭認為 CY002326 號借款單僅僅證明“輔助人事後聲明為相關借款的債務人”，是一個明顯的錯誤，明顯一個受中等教育的人都能發現，被上訴之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之明顯錯誤瑕疵。
15. 於 2010 年 7 月 27 日，輔助人向法院申請提交五份文件，當中包括 CY002326 號借款單和佣金單。
16. 上述兩份文件顯示出的簽署日期是 2009 年 2 月 4 日，相關的簽署人於當日沒有簽名，相關的簽署人之後才在前述之文件上簽名。但兩份文件的內容證明相關的簽署人於 2009 年 2 月 4 日簽署 CY002326 號借款單和佣金單，這樣，CY002326 號借款單和佣金單便載有了與事實不符的內容，相關的簽署人使法律上屬重要之事實，不實地載於文件上，符合了《刑法典》第 244 條第 1 款 b 項規定的偽造文件罪中的一個要件，足以認定輔助人遞交的文件屬偽造文

件。

17. 既證事實指第二嫌犯 B 亦多次替 D 到 Y 貴賓廳提取款項移至 X 貴賓廳，但從偵查至審判結束，輔助人除向法院提交有疑問的 CY002326 號借款單外，沒有向法院提交更多第二嫌犯 B 有參與送款活動的借款單。
18. 基於以上所述，被上訴之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之明顯錯誤瑕疵。
19. 既證事實的事實判斷 5.3 指輔助人向 Y 貴賓廳暫借港幣 5000 萬圓的目的是為了“出碼糧”，而輔助人在卷宗第 2 頁背面講述的借款原因是供客人賭博之用。
20. 基於輔助人的口供前後矛盾，仍然相信其中的一個版本，被上訴之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之明顯錯誤瑕疵。
21. 輔助人從開始向司法警察局報案至其後的口供中，均使用“致電”一詞，意思是指用電話聯絡，不是指用電腦網絡視頻電話聯絡。
22. 輔助人於卷宗第 3 頁背面亦講述，接獲 C 的來電，電話中可確認將款項交給兩名嫌犯。
23. 證人 C 於卷宗第 10 頁亦使用“陳述人接獲被害人之電話”之表述。
24. 面對卷宗內的通話記錄，輔助人和 C 在庭上表示，當日透過電腦網絡視頻電話聯絡(見判決書事實之判斷 5.3)。
25. 判決書事實之判斷 5.3 亦提到：“證人 J 和 K 表示，Y 貴賓廳沒有使用電腦網絡視頻電話，而“老闆”房間內的具體情況，其等則不得而知。”

此外，法律亦禁止將賭場範圍的影像通過互聯網外傳。

26. 面對上述的情況，仍然證明：“同日早上 10 時 15 分，兩名嫌犯到達 Y 貴賓廳，要求提取港幣 53819640 圓。該貴賓廳負責人 C 致電 D，經 D 口頭確實給付後”。
27. 這樣，被上訴之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之明顯錯誤瑕疵。
28. 判決書事實之判斷 5.2 最後兩段提到：“除了證人 G 之外，在 Y 貴賓會的工作人員表示不認識“三哥”，或其並非該貴賓會的股東。”
29. 參考卷宗的資料，Y 貴賓會的工作人員包括負責人 C、F 和 G 和載於控訴書的部分證人。
30. 證人 C 回答檢察官問題時指出，當時台灣人“三哥”在休息室內，“三哥”有可能是我們的股東有帶客戶過來的。(參考 Recorded on 20-Jul-2010 at 16.38.39 (-VJ#1 VCW05111270)庭上第 01:47:45 分鐘的錄音)
31. F 在庭審中講述三哥是 L，是 L 聘請 F 在 Y 貴賓會工作的。
32. 這樣，法院的心證是基於錯誤的事實而作出的，被上訴之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之明顯錯誤瑕疵。
33. Y 貴賓廳一般的出碼糧時間是每個月的五號，但卻於 2 月 4 日便將 300 多萬碼糧支付給輔助人；
34. Y 貴賓廳賭廳內涉及大額款項的交付，應以錄音電話的形式留下證據，並且需由交付及收款的經手人簽名，但輔助人向 Y 貴賓廳借取五千萬圓時卻沒有遵守前述之程序。
35. 輔助人和 Y 貴賓廳的人員講述五千萬圓借款和三百多萬碼糧的移交完全違反賭廳的一般經營法則，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仍然取信完全違反賭廳經營法則的證言，故沾有審查證據方面之明顯錯誤瑕疵。

違反調查原則和發現事實真相原則

36. 上訴人在收到開庭日期之後，向法院申請去信澳門金沙娛樂場要求將第二嫌犯於案發當日在金沙賭場內投注的相關紀錄和影帶附入卷宗，但被拒絕。
37. 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認為證明相關的籌碼及現金來自“賭底面”屬於兩名嫌犯的責任，故沒有作出任何相關的調查措施，包括去信澳門金沙娛樂場，要求其提供 M(M)於 2009 年 2 月 4 日在金沙賭場賭枱 MD904(或稱 30-904)的贏錢紀錄，以及將當日現場賭台賭博過程的錄像附入卷宗，便可以清楚知道當晚的整個賭博過程，包括參與賭博人的資料、相關的聯絡方式以及各人的相貌，根據這些資料再聯絡 M、三哥和其他負責紀錄賭博輸贏的人，要求他們出庭作供。
38. 在欠缺於案發日參與金沙賭場賭博的人士出庭作證的情況下，最後無法證實涉及的款項是源自賭底面的款項。
39. 案發當日，輔助人 D、N、上訴人和在金沙賭場內觀看賭博的 G 以及 F 有近百次的電話聯絡，按照經驗法則，令人相信各人非常關心金沙賭場內的輸贏紀錄，因為當中涉及數以千萬計的款項，而且 G 和 F 當時身在賭博現場。
40. 庭審中播放的錄影帶清楚顯示，案發當日 Y 貴賓廳的帳房人員是將港幣 53819640 圓的現金和籌碼交給一名叫阿權的人士，但法庭並沒有傳召前述之阿權出庭作供，阿權的供詞將會清楚交待前述之款項是用於借款用途還是用於支付賭底面輸了的款項。
41. 被上訴的法庭欠缺作出其應該作出的調查措施，違反了《刑

事訴訟法典》第 321 條第 1 款之規定。

42. 上訴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107 條第 2 款 d 項之規定，對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沒有遵守調查原則和發現事實真相原則而引起的無效提出爭辯。

無效

43. 被上訴之法庭依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74 條裁定損害賠償給受害人，然而，受害人在庭審過程中沒有提出賠償的金額；此外，上訴人亦沒有機會就裁定港幣 53819640 圓之賠償金額發表意見，法院在欠缺受害人提出賠償請求和沒有讓上訴人行使辯護權的情況下，裁定港幣 53819640 圓之賠償金額給受害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 74 條第 2 款之規定，該條款要求就調查損害賠償證據方面，法官須確保尊重辯論原則。
44. 向兩名嫌犯適用羈押措施的決定載於判決書內，法庭在作出前述決定前沒有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故向兩名嫌犯適用羈押措施的決定違反了辯論原則。
45. 辯論原則作為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原則，其價值受到《澳門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肯定。
46. 被上訴的裁判沒有遵守辯論原則，應被宣告無效。
47. 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沒有審理上訴人在答辯狀中提出輔助人違反司法保密義務致使證據無效的請求，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四條命令適用的《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條 1 款 d 項規定。
48. 由於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沒有審理上訴人提出輔助人違反司法保密義務這一事實，應被宣告無效。

違反罪疑存無原則

49. 以上所述的疑點在此視為完全轉錄，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罪疑存無原則。

最後，上訴人認為應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並提出下列請求：

1. 宣告開釋上訴人被判處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或
2. 將案件發還重審。
3.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5 條，敬請中級法院再次調查證據：
1)使用適當的器材播放卷宗第 36 頁光碟(編號：Log568781 及 04-02-09)，以便上訴審法院能夠審理在法律上視為文件的編號：Log568781 及 04-02-09 光碟；2)聽取初級法院的庭審錄音，播放 Recorded on 20-Jul-2010 at 16.38.39(-VJ#1VCW05111270)庭上第 52:56 至 58 分鐘的錄音，目的是證明 X 貴賓會是由多名股東經營的；播放 Recorded on 20-Jul-2010 at 16.38.39 (-VJ#1VCW05111270)，時段：01:49:00 至 01:51:00 的錄音，目的是證明當時在 Y 貴賓廳帳房前提款的人是阿權；播放 Recorded on 20-Jul-2010 at 16.38.39 (-VJ#1VCW05111270) 01:46:45 至 01:48:00 分鐘的錄音，目的是證明三哥當時在 Y 貴賓廳的休息室內。
4. 並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一如既往地作出公正裁決。

上訴人 B 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Existem nos autos duas versões opostas sobre os factos.
2. Uma, a da acusação, segundo a qual existia uma ligação comercial entre a Sala X e a Sala Y do Casino CROWN, havendo-se a

arguida deslocado várias vezes entre ambas, como estafeta e em representação de D, para proceder ao levantamento de dinheiro e fichas de jogo, havendo-se, nomeadamente, deslocado pelas 10H 15M da manhã do dia 4/2/2009 à Sala Y e procedido ao levantamento do montante de HK\$53,819,640.00, em numerário e fichas, pertencente ao assistente, havendo-o desviado em proveito próprio abusando da confiança do assistente, seu patrão.

3. Outra, a versão da defesa, segundo a qual a arguida se dedicou sempre à actividade de bate-fichas ou promotora de jogo e era detentora de contas abertas em várias salas VIP para jogo de diferentes casinos em Macau, nunca prestou qualquer serviço ao assistente ou teve qualquer relação hierárquica com ele, tinha ganho ao jogo paralelo praticado com o cliente M no dia 4/2/2009, numa sala VIP do casino “The Sands”, a importância global de HK\$53,819,640.00, correspondente, como decorre das regras dessa prática ilícita, ao dobro da quantia ganha no jogo legal, a cujo levantamento legítimo procedeu na sala VIP Y.
4. Como o “The Sands” é uma empresa listada americana, e está vinculado pela Lei de Branqueamento de Macau, quando o jogador M (M) ganhou, no dia 4/2/2009 as 3 apostas no valor de \$26,280,000.00, os departamentos de “Gaming Department” e de “Surveillance Department” do Casino The Sands (isto é o Grupo de Venetian), elaboraram um relatório, fazendo registar o jogo em que teve participação, como bate-fichas, a arguida, assistindo o apostador M.

5. Concluiu o Distinto Colectivo que inexistem suspeitas de falsidade da nota de débito n.º CY002326 e do “recibo da comissão” que foram juntos ao processo pelo assistente em 27/7/2010, mau grado a recorrente tenha suscitado o incidente de falsidade de tais documentos e o tribunal tenha dada como provado que a assinatura do assistente nesses documentos foi aposta efectivamente «depois dos factos», pelo que, sempre e de todo o modo, os aludidos documentos, deveriam ter sido julgados falsos e desconsiderados como elemento de prova.
6. O incidente de falsidade dos aludidos documentos fora suscitado através de requerimento da ora alegante apresentado em 29/07/2010, com fundamento em que tais documentos apenas foram apresentados pelo assistente em julgamento, na sessão 27/07/2010, e não antes, já depois de terem sido dados por destruídos pela Sala VIP Y, de que se afirmou responsável a principal testemunha do assistente, C.
7. O recibo de comissão de troca de fichas emitido pela Sala VIP Y ao assistente, D, alegadamente assinado em 04/02/2009 não fora apresentado ou junto aos autos pelo assistente quando deu a participação criminal contra os arguidos em 06/02/2009 nem quando prestou declarações, na PJ, no mesmo dia.
8. A Sala VIP Y, que alegadamente teria pago a importância titulada por tal documento, através de carta subscrita pelo próprio e referido C, com apresentação de 15/07/2010, deu a conhecer que já não lhe era possível juntá-lo por o haver destruído, uma

vez que tinham já passado mais de seis meses sobre a sua emissão.

9. Tal explicação é inadmissível, porque as salas de jogo dos casinos estão sujeitas ao pagamento de imposto de rendimentos e a Lei n.º 21/78/M, reguladora de tal imposto, impõe, no seu art.º 18.º, n.º 4, a conservação por cinco anos dos livros de escrituração e dos documentos com ela relacionados.
10. O argumento explicativo da falta de espaço não tem, em si mesmo, qualquer justificação porque os casinos dispõem de tesourarias tecnologicamente apetrechadas, permitindo a digitalização de documentos.
11. Tudo aponta para que se trata de documento emitido em data posterior e antedatado e, portanto, de documento totalmente falso, alicerçando a suspeita de que se trate de documento emitido em data posterior, para prova de um facto alegadamente ocorrido muitos meses antes.
12. Pelo menos, face à comunicação escrita que deu o documento por destruído, não é possível alcançar uma certeza, que exclua qualquer dúvida razoável quanto à possibilidade de tal documento ser falso e ter sido emitido «no último minuto» com o exclusivo propósito de dar crédito à tese do assistente D.
13. O documento que alegadamente titula o empréstimo de 50 milhões foi emitido por uma sociedade comercial, a Z INTERNATIONAL LIMITED, assinado por C como mutuante e por D como mutuário, sendo que o mutuante não é sócio nem

desenvolve qualquer cargo na referida sociedade, conforme prova documental oferecida.

14. Ao expressar a sua convicção sobre a questão, o tribunal recorrido entendeu que no processo não há prova que indique que o signatário do recibo do Grupo VIP Y - C - não tinha poderes para o assinar, reconhecendo embora que os dois documentos - numa referência quer ao recibo da comissão quer ao documento que titularia o empréstimo de 50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 foram assinados depois de terem acontecido os factos neles descritos.
15. Não parece compreensível uma tal conclusão do Ilustre Colectivo, desde logo porque o documento de fls. 929 e seguintes confirma que C, não tem quaisquer poderes de representação da referida sociedade.
16. A conclusão atingida pelo Ilustre Colectivo de que «não há prova que indique que o signatário do recibo do Grupo VIP Y – C, não tinha poderes para o assinar» mostra-se totalmente à margem de prova documental oferecida pela recorrente.
17. Não há, em relação aos referidos documentos, qualquer possibilidade de assegurar que eles não tenham sido fabricados ulteriormente à data da carta que anunciou a destruição de um deles e a inexistência de outro.
18. O facto assente pelo Colectivo de que «foram assinados já depois dos factos» importa sempre a sua falsidade, face ao art.º 244.º do Código Penal, pois, mesmo numa perspectiva minimalista e a

partir de um facto provado no douto Ac. recorrido, trata-se de um documento que foi ilegitimamente alterado e que faz incorrer o autor ou autores da alteração e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19. Deviam, em conformidade tais documentos ter sido julgados falsos ou, ao menos gravemente duvidosos, e não terem sido, em consequência, sido admitidos como prova dos factos imputados aos arguidos.
20. Ou, alternativamente, terem sido devidamente retiradas, da alteração nele introduzida, as devid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recusando-se-lhes a credibilidade probatória que, de outro modo, teriam.
21. Para mais, quando o 1.º documento se mostra assinado pelo assistente e não pela pessoa, a arguida Mau In, que foi quem, na tese da acusação, recebeu esse montante a título de troca de fichas.
22. A tudo acrescentando o lado inverosímil de haver o recibo alegadamente comprovativo do alegado empréstimo de C ao assistente D ter sido alegadamente assinado às 10H 02M da manhã e o valor do empréstimo sido entregue ao intermediário do assistente, alegadamente a recorrente Mau In, apenas às 10H 21M 30S, isto é, mutuante e mutuário teriam subscrito o documento titulando a concessão do empréstimo 19 minutos antes mesmo da quantia mutuada ter sido entregue ao alegado intermediário/transportador do mutuário!
23. Constatando-se do vídeo examinado em audiência que às 10H

02M a arguida Mau In estava na sala VIP Y (aleadamente mutuante) estranha-se que, havendo-lhe as fichas e numerário no avultado valor de HK\$53,819,640.00 sido a ela entregues, ela não tenha sido compelida a assinar o referido recibo - na qualidade de representante do assistente D - o qual, a dar crédito ao assistente, já fora antes por ele assinado!

24. Dar simultâneamente como provado que a recorrente era promotora de jogo (ou bate fichas) e estafeta de uma sala VIP afigura-se, em si mesmo, um contrasenso, dado o volume de negócios em que se traduz a actividade de promotora de jogo.
25. Existem em todos os casinos regras de procedimento gerais, quando estiver envolvida a entrega de valores, devendo ser feita através do telefone com função de gravação como elemento de prova, sendo exigidas ainda as assinaturas daquele que recebe e daquele que entrega o dinheiro no documento.
26. Facto reconhecido pelo tribunal, quando concluiu que «(...) pel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da acusação e da defesa e dos documentos resulta que, de facto, é esse o procedimento habitual».
27. Face a essa conclusão não deveria ter-se admitido a tese das testemunhas da acusação funcionários das duas salas VIP no sentido de que a «boa relação» entre o assistente D e o patrão da Sala VIP Y, C, dispensava tais regras de procedimento, por ser um entendimento que atenta contra o senso comum e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28. O art.º 3.º, n.º 6, da Lei 5/2004, de 31 de Maio de 2004 - regime jurídico da concessão de crédito para jogo ou aposta em casino - fixa rigorosamente as situações em que pode haver concessão de empréstimos e não inclui a situação do alegado empréstimo reportado nos autos, entre duas salas VIP de um casino.
29. É inadmissível que um empréstimo entre duas salas VIP, para além de ilegal, tivesse estado subtraído às formalidades impostas.
30. Afigura-se um extraordinário acaso da vida a coincidência temporal entre tal empréstimo entre as duas salas VIP no exacto dia em que se demonstrou a ocorrência de um jogo numa mesa de jogo do distante hotel casino Sands no qual, licitamente, um jogador de Taiwan ganhara exactamente metade desse valor conjugado e dois arguidos num processo crime correndo termos em Macau alegaram ter estado nesse jogo, debaixo da mesa, em jogo ilícito ou paralelo.
31. O art.º 30.º da Lei 16/2001 impõe às concessionárias e às sociedades gestoras a dotação de uma contabilidade própria, de boa organização administrativa e de adequados procedimentos de controlo interno, perante as quais é dificilmente aceitável a tese da acusação.
32. Assume, perante tais regras, uma natureza quase patética a ideia de um indivíduo instalado num sofá de um hotel telefonar para outro que movimenta milhões e lhe solicita um empréstimo de 50 milhões na base da confiança.
33. O tribunal não poderia ter colocado em causa a ocorrência, pelo

menos, do jogo legal em que esteve envolvida a recorrente no dia dos factos, face ao Relatório do Grupo Sands, de 4/2/2009, apresentado pela 2.^a arguida em 30/7/2010, que confirmou a existência e prática desse jogo.

34. Tal Relatório faz referência à comissão de troca de fichas da recorrente, e dele resulta que o exacto valor levantado pela recorrente e o co-arguido A, às 10H 15M da manhã de 4/02/2009, na tesouraria da Sala VIP Y corresponde exactamente ao dobro dos valores envolvidos no jogo legal (em cima da mesa).
35. Tal coincidência de valores faz pressupôr o jogo paralelo alegado pelos arguidos, ainda que a prova desse facto não tenha sido feita, por impossibilidade, uma vez que a sua prova importaria às testemunhas que o confirmassem o envolvimento em responsabilidade criminal.
36. É difícil admitir que enquanto «estafeta» do seu alegado patrão D, tivesse a arguida sido chZda, através do marido, o co-arguido A, para se deslocar à sala VIP Y, para cumprir uma tarefa ocasional de transporte de dinheiro e fichas para jogo, dado o facto de ter estado envolvida em jogo no casino Sands durante toda a madrugada e princípio da manhã desse dia.
37. A factualidade que os arguidos lograram provar em audiência não pode excluir a possibilidade, e uma possibilidade considerável, de que o jogo paralelo tenha ocorrido, em termos geradores de uma dúvida razoável quanto à veracidade dos seus

depoimentos, de tal sorte que a sua condenação pelo crime de abuso de confiança que lhes foi imputado não era possível para além dessa dúvida razoável, a qual imporia, face a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a sua absolvição do aludido crime ainda que à custa da instauração de um (outro) procedimento criminal pelo seu envolvimento no crime de jogo ilícito.

38. As testemunhas de acusação que puderam pronunciar-se sobre o (alegado) empréstimo e sobre o (alegado) direito a uma comissão de troca de fichas do assistente - P, Q, J, R e K - são todas empregadas das duas salas VIP envolvidas, e tinham, por isso, condicionamentos no seu papel de testemunhas, pelo que deviam os seus depoimentos ter sido rodeados de redobradas cautelas.
39. É, assim, legítimo que se coloquem reservas aos depoimentos de todas as referidas testemunhas, as quais dificilmente poderiam afastar-se da versão trazida aos autos pelos seus patrões, D ou C.
40. 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F (Ah Ngau) e G (Ah-Pen) afiguram-se da maior relevância, porque já não exerciam, à data do julgamento, qualquer actividade profissional para qualquer das salas VIP em questão nestes autos e, ainda, porque estiveram presentes na sala VIP Y e assistiram à entrega do mencionado valor aos arguidos, a quem ajudaram no transporte do 9.º andar do hotel casino Crown para o R/C, havendo-os acompanhado até ao exterior do hotel casino Crown, o que é atestado pelo vídeo fornecido pelo referido hotel casino e pelas fotografias que dele se extraíram.

41. Nos seus depoimentos, as referidas testemunhas provaram importantes segmentos da versão da recorrente, nomeadamente quanto à identificação do pagador, L, S, e ao facto dos valores recebidos lhes terem sido a eles entregues como ganho de jogo e comissão de troca de fichas obtido pela recorrente.
42. O conjunto de fotografias extraídas do vídeo e juntas a esta minuta é demonstrativo de que a arguida B desconhecia os caminhos internos da sala VIP Y, o que se afigura incompatível com 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empregados das duas salas que afirmaram que ela, enquanto estafeta do assistente, transportava amiúde valores entre as tesourarias das duas salas e com o respectivo facto dado por provado pelo douto tribunal.
43. Na parte em que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decidiu no sentido da falsidade dos documentos que titulam o (alegado) crédito de 50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e o (alegado) direito a uma comissão de troca de fichas de que seria titular o assistente, mau grado haja sido dado por provado que a assinatura do assistente foi aposta no documento posteriormente aos factos, o tribunal recorrido incorreu e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44. No segmento em que deu por não comprovada a prática de jogo no casino Sands, através de apostas por telefone do apostador M, com a assistência da recorrente na troca de fichas, o tribunal decidiu contra documento que provava inapelavelmente esse facto, incorrendo na violação das regras sobre o valor da prova

vinculada ou legis artis.

45. Na parte em que deu por provados o empréstimo e o direito a uma comissão sobre troca de fichas envolvendo as duas salas VIP, contra a violação das regras de procedimento internas dos casinos que deu igualmente como provadas, o tribunal recorrido incorreu no vício 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a fundamentação.
46. A decisão recorrida violou a norma do art.º 199.º, n.º 1 e 4, alínea b) do Código Penal ao proceder à sua aplicação num quadro que impunha a sua desaplicação.
47. Violou, ainda, 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NOS TERMOS E COM OS FUNDAMENTOS EXPOSTOS e contando com o indispensável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 ser concedi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e, na procedência dos apontados vícios, revogado o douto Ac. recorrido e absolvida a recorrente do crime por que foi condenada.

Procedendo como se requer, na modesta mas firme convicção da recorrente, farão Vossas Excelências boa e sã JUSTIÇA!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就上訴人 A 所提出之上訴：

1. 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a) 項所述瑕疵—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2. 根據原審判決，控訴書中與上訴人相關之事實均獲得證實，並無任何遺漏，而且獲證明之事實相當充份，就其觸

犯《刑法典》第 199 條第 1 款及第 4 款 b 項規定及處罰之一項信任之濫用罪，足以作出有罪判決。基此，上訴人所述瑕疵，並無出現。

3. 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4. 根據原審判決中獲證明之事實及不獲證明之事實，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

就上訴人 B 所提出之上訴：

1. 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2. 對於上訴人的觀點，不能予以認同。
3. 根據原審判決中獲證明之事實及不獲證明之事實，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
4. 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出現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理由是原審法庭認為涉案之款項是借貸及碼糧，又認為行內慣常的作法，涉及大額款項的交付，應以錄音電話的形式留下證據，並且需由交付及收款的經手人簽名。
5. 正如證人 J 所聲明，以輔助人與 Y 貴賓廳老闆之間的熟悉關係，實際上並不需要上述的手續，通常係由工作人員準備好相關的借款單，再由輔助人過後補簽。另外亦有證人聲明在 Y 貴賓廳設立時，輔助人亦有指派職員到達 Y 以前輩身份給予指導意見。由此可見彼此關係非常良好。
6. 另一方面，因為借貸的金額往往十分巨大，又無需作出任何抵押，倘有賴帳，提起執行程序亦無法滿足有關債權，所以有關借貸之文件往往祇是一紙紀錄，最重要的反而是

背後的信任關係，故此，容許取款後才簽署借貸文件，在具體情況下屬合理做法。

7. 基此，上訴人所述瑕疵，並無出現。

最後，檢察院認為兩名上訴人應理由均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 閣下作出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兩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應予以駁回。

本院接受兩名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4 條規定舉行了聽證，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D（輔助人）是澳門皇冠娛樂場八樓 X 貴賓廳的廳主。D 於 2007 年認識第一嫌犯 A，並得悉其任職於澳門海關。二人成為朋友，關係密切。
2. 2008 年，D 讓第一嫌犯 A 之妻子（即：第二嫌犯 B）在 X 貴賓廳幫忙跑腿，負責招待賭客及送交款項的工作，但雙方沒有建立正式的僱傭關係，D 只會在 B 提供工作服務後向其給付一些報酬。第一嫌犯 A 有時亦會協助其妻子到貴

賓廳提取款項。

3. X 貴賓廳一向與皇冠娛樂場九樓的 Y 貴賓廳有款項來往，第二嫌犯 B 亦多次替 D 到 Y 貴賓廳提取款項轉移至 X 貴賓廳。由於 D 充分信任兩名嫌犯，不時會讓其等協助提取巨額款項。
4. 2009 年 2 月 4 日早上約 9 時 25 分，D 致電第一嫌犯 A，要求其通知第二嫌犯 B 到皇冠娛樂場九樓 Y 貴賓廳提取一筆籌碼及現金，合共港幣 53819640 圓，然後將之交到 X 貴賓廳。
5. 同日早上 10 時 15 分，兩名嫌犯到達 Y 貴賓廳，要求提取港幣 53819640 圓。該貴賓廳負責人 C 致電 D，經 D 口頭確實給付後，C 將七個一百萬、一個五十萬、五個十萬之永利娛樂場港幣現金籌碼，以及四十八個五十萬、九個十萬之金沙集團港幣現金籌碼，以及一個一萬之葡京娛樂場港幣現金籌碼，以及十二個一百萬、九個十萬之皇冠娛樂場港幣現金籌碼，連同港幣現金 8009640 圓，即合共港幣 53819640 圓之款項交予兩名嫌犯。
6. 兩名嫌犯取去該筆款項後，將之據為己有，並於同日早上 10 時 51 分離開澳門，進入中國內地。
7. 兩名嫌犯在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利用 D 對其等的信任，將 D 託其暫時保管之動產取去，違反物主的意願，將明知屬他人之財產據為己有，使 D 蒙受金錢損失。
8. 兩名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乃犯法行為，為本澳法律所禁止及處罰。

*

9. 屬於輔助人的涉案款項已追回及凍結了大半，包括：扣押了 1100 萬圓的籌碼、港幣 13 萬圓現金、在內地被凍結人民幣 1700 多萬圓。

*

10. 第二嫌犯 B 為博彩中介人。
11. 金沙集團 2009 年 2 月 4 日的報告顯示，M 由 N 替其出面，進行電話賭博，利用第二嫌犯的戶口轉碼；在 02:00 至 08:00 期間，M 贏得大約港幣 2628 萬圓；第二嫌犯的轉碼記錄為港幣 3499 萬圓，每轉碼 10 萬圓可獲傭金 1200 圓。

*

另外，亦證明下列事實：

12. 第一嫌犯為海關關務監督，月收入約澳門幣 4 萬圓；需贍養父母、撫養一子；其學歷為碩士畢業。
13. 第二嫌犯為疊碼，平均月收入約澳門幣 10 萬圓；需贍養父母、撫養一子；其學歷為高中畢業。
14. 根據嫌犯的刑事犯罪記錄證明，兩嫌犯為初犯。

*

未獲證明之事實：

1. 控訴書中之事實未有未獲證明的事實。
2. 答辯狀中其餘與上述獲證明事實不符之事實不獲證明，特別是：
3. 兩嫌犯收到的相關籌碼及現金係通過賭外圍的方式而贏取。

三、 法律方面

上訴人 A 的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調查原則及發現事實真相原則
- 無效
- 罪疑從無原則

1. 上訴人 A 提出既證事實中證人沒有清楚交待涉案款項港幣 53,819,640 圓交給兩名上訴人的原因，沒有指出上訴人 B、輔助人 D 及 Y 貴賓廳之間的法律關係，以及缺乏闡釋涉案款項所屬權。因此，上述既證事實並不符合信用之濫用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存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a) 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 2009 年 7 月 15 日，在第 18/2009 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然而，根據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

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亦未發現存在漏洞，故此，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a) 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另一方面，上訴人所提出的實質上是法律上錯誤的瑕疵，上訴人認為經證明之事實並不符合信任之濫用罪的犯罪構成要件。

為了判斷在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是否存在上述問題，需要審查被認定事實。

根據原審法院判決中已確認的事實，“2008 年，D 讓第一嫌犯 A 之妻子（即：第二嫌犯 B）在 X 貴賓廳幫忙跑腿，負責招待賭客及送交款項的工作，但雙方沒有建立正式的僱傭關係，D 只會在 B 提供工作服務後向其給付一些報酬。第一嫌犯 A 有時亦會協助其妻子到貴賓廳提取款項。

X 貴賓廳一向與皇冠娛樂場九樓的 Y 貴賓廳有款項來往，第二嫌犯 B 亦多次替 D 到 Y 貴賓廳提取款項轉移至 X 貴賓廳。由於 D 充分信任兩名嫌犯，不時會讓其等協助提取巨額款項。

2009 年 2 月 4 日早上約 9 時 25 分，D 致電第一嫌犯 A，要求其通知第二嫌犯 B 到皇冠娛樂場九樓 Y 貴賓廳提取一筆籌碼及現金，合共港幣 53819640 圓，然後將之交到 X 貴賓廳。

兩名嫌犯取去該筆款項後，將之據為己有，並於同日早上 10 時 51 分離開澳門，進入中國內地。”

由此可見，原審法院確認了上訴人及其妻子與輔助人 D 的關係，從已確認的事實中，可以推斷出上述款項的所有人。上訴人及其

妻子利用 D 對彼等的信任，將本該交予他人的巨額款項據為己有，其行為已完全滿足《刑法典》第 199 條第 1 款及第 4 款 b) 項，結合第 196 條 b) 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信任之濫用罪的犯罪構成要件。

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並沒有上訴人所指的瑕疵，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述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 A 亦提出了原審法院的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存有明顯錯誤，因而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 項的瑕疵。故此，中級法院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5 條的規定，再次調查證據。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 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 2001 年 3 月 16 日，在第 16/2000 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根據原審判決中獲證明之事實及不獲證明之事實，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之判斷中作出詳細的說明：“客

觀綜合分析了在審判聽證中觀看的錄影、在審判聽證中兩嫌犯之聲明、輔助人的聲明、證人證言、審判聽證中審查電話通訊記錄文件及其他書證、扣押物證及其他證據後，本合議庭作出上述事實認定。需特別指出：

1) 兩嫌犯出席審判聽證。兩嫌犯否認作出了被指控的事實。

2) 對於嫌犯聲明、輔助人聲明以及證人證言的部份，合議庭係通過對其等的遣詞用句、身體語言、相互之間的關係、其等與調查事實的關聯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判斷之後，而作出上述之事實認定。

3) 關於輔助人於 2010 年 7 月 27 日提交的 CY002326 號借款單以及“傭金單”，第二嫌犯質疑該等文件為偽造文件。

輔助人在提交上述文件時說明，該等文件早在 2 月 4 日案發當日已準備就緒（其中的借款單已列明借款時間、金額及文件簽署日期），只是輔助人實際簽署係於事發之後。

第二嫌犯將上述借款單與案中另一借款單進行比較，借款單的號碼小而日期在後，號碼大的，日期反而在前，另外，上述借款單並非由股東簽署，此外，“傭金單”的簽發日期並非實際支付傭金的日期，且實際運作上沒有提前支付傭金的慣例，再者，合議庭曾要求 Y 貴賓廳提供輔助人的“轉碼”紀錄，但是 Y 貴賓廳回覆說相關的紀錄已經銷毀，輔助人卻於 7 月 27 日提交了“傭金單”，最後，輔助人在最初報警時並沒有透露有上述相關文件的存在，到最後得以提供，顯見地，該等文件屬於事發之後偽造的文件，不具有證明效力。

對此問題，證人 K 解釋，實際運作上會同時使用多本單據，才會出現單據號碼與單據日期倒置的情況；事發當日，其依照 C 的指示準備了相關的籌碼及現金，借款單是當日填寫的（包括金額及日期），由輔助人於事後補簽，借款日期未作更改。

合議庭亦發現，第二嫌犯回應輔助人而提供的其他證據文件(大成投資有限公司威尼斯人度假娛樂場簽發給第二嫌犯的借款單正本)，同樣存在類似的前單和後單的單據號碼倒置的情況。

此外，轉碼記錄不等同於“傭金單”

案中並無證據顯示 Y 貴賓會簽署結單之人並沒有簽署權限。

故此，合議庭認為，輔助人承認、證人證明相關單據係由輔助人事後補簽，僅憑相關單據的號碼與日期的倒置，以及嫌犯上述其他懷疑，並不足以認定輔助人提交的文件屬於偽造文件；然而，兩份文件為文件所記載之事實發生之後所簽署，那麼，該兩份文件僅僅證明：輔助人事後聲明為相關借款的債務人及收取到相關的傭金。

4) 關於兩名嫌犯與輔助人的關係：

根據卷宗所取得的證據，特別兩名嫌犯的聲明、輔助人的聲明、證人 P 及 R 等的證言，兩名嫌犯確實不止一次地協助輔助人運碼。

第二嫌犯否認其係 X 貴賓廳的跑腿，亦沒有為輔助人 D 提供任何工作服務；並且，第二嫌犯係自願的疊碼中介，沒有與輔助人簽訂雇傭合約。

合議庭認為，第二嫌犯雖為自願的疊碼中介，但僅此理由，並不能排除其幫助輔助人“跑腿”(為人奔走作雜事)的事實，兩者之間並非相互矛盾、排斥的關係。同樣地，第一嫌犯雖任職澳門海關，亦不能以此為由否定其協助輔助人運碼的事實。

5) 關於相關籌碼及現金的所有人及其交付名義：

5.1) 輔助人聲稱致電第一嫌犯，要求其著第二嫌犯幫忙“運碼”。

證人 C 聲稱，按照輔助人的指示將相關的籌碼及現金交付給兩名嫌犯。

第一嫌犯聲稱：輔助人在事發前一天的深夜至事發當天的上

午，打過 30 多次電話給第一嫌犯，絕對沒有要求其著第二嫌犯運送款項及籌碼。

在審判聽證過程中，第一嫌犯聲稱，當日輔助人在電話中要求第一嫌犯幫助其“追數”，因為 M 欠其金錢。輔助人要求第一嫌犯將 M 的金錢扣下，轉交給輔助人。

兩名嫌犯確認在 Y 貴賓廳收到了 5300 多萬元的籌碼及現金，然而，該筆款項並不屬於輔助人 D，而是綽號“三哥”的一名臺灣人支付給 M 和兩名嫌犯的，是“三哥”坐莊與 M、兩嫌犯及 N “賭底面”輸掉的款項。“三哥”聲稱是 Y 貴賓廳的股東之一，兩名嫌犯完全相信。

在審判聽證過程中，輔助人否認認識上述名叫 M 的人士。

5.2) 至於相關的籌碼及現金是否來自“賭底面”：

本案，沒有實質的證據顯示涉案的籌碼及現金提取自“三哥”以任何名義存放在 Y 貴賓會的屬於“三哥”的財產。

根據第二嫌犯於 2010 年 7 月 30 日提交的金沙集團關於 2009 年 2 月 4 日的報告顯示，在檯面賭博上，M 由 N 替其出面，進行電話賭博，利用第二嫌犯的戶口轉碼；在 02:00 至 08:00 期間，M 贏得大約港幣 2628 萬圓；第二嫌犯的轉碼記錄為港幣 3499 萬圓，每轉碼 10 萬圓可獲傭金 1200 圓。

兩名嫌犯指出，根據上述檯面賭博，“三哥”作外圍莊家同時與 M、兩嫌犯及 N 賭底面，賭大兩倍，M 占 50%，兩嫌犯占 45%，N 占 5%。

兩名嫌犯指出，當時“賭底面”不直接作現金或籌碼支付，而是有人在一旁記錄勝負結果。

本案，沒有負責記錄的人士出庭作證，亦沒有任何記錄勝負結果的紙張作為證據。

在審判聽證過程中，法庭問及兩名嫌犯既已直接參與賭博，為何又要同時收取轉碼傭金，以及傭金比例如何確定，對此，兩名嫌犯沒有給予直接的解釋。

對於兩嫌犯直接參與賭底面，如果賭輸，如何支付可能產生的巨額金錢，兩嫌犯對此沒有給予直接的解釋。

證人 F 及 G 表示，當時在場幫忙，但不清楚同時在“賭底面”，只是見到有人作記錄。

證人 N 聲稱，當日沒有參與“賭底面”；當天也沒有與兩名嫌犯進行任何電話聯繫。

根據卷宗的電話記錄，當日，第一嫌犯的電話與 N 的電話之間曾有通話記錄。此外，案發之後，兩電話之間亦有聯繫。

兩名嫌犯聲稱，案發之後，在珠海將港幣 300 萬圓交給了 N 的妻子 T。

證人 T 否認，聲稱從來沒有收取過兩嫌犯的任何金錢。

經司警偵查顯示，第一嫌犯與證人 F 及 G 之間，在事發之前、事發當日以及事發之後，一直保持有電話聯絡。

關於 M 的身份資料和聯繫方式，兩嫌犯表示無法提供；關於替 M 出面賭博之人的身份資料和聯繫方式，兩嫌犯亦未能提供；關於相關籌碼及款項交予何人，兩嫌犯亦未能提供有關人士的身份資料和聯繫方式。

第一嫌犯表示，其被截查之後，曾經聯絡到“三哥”，要求其說明有關港幣 5300 多萬圓的賭博贏錢經過；“三哥”表示不願意招惹麻煩；之後，第一嫌犯再也聯繫不到“三哥”。

除了證人 G 之外，在 Y 貴賓會的工作人員表示不認識“三哥”，或其並非該貴賓會的股東。

合議庭認為，首先，在博彩場地內“賭底面”為本澳法律所禁止；其次，即使存在檯面賭博，並不表示一定存在著“賭底面”的行為。本案關於“賭底面”的證據，兩名嫌犯未能提交更加充分而確鑿的事實證據。

5.3) 關於相關籌碼及現金的交付：

輔助人及證人 C 表示，當日透過電腦網路視頻電話，輔助人向 Y 貴賓廳的管理人 C 表示暫借港幣 5000 萬圓周轉，因第二日便是“出碼糧”的時間；根據 C 的提議，同時將輔助人應收的疊碼傭金交付予前去取款之人。

兩名嫌犯認為，當日輔助人與 C 之間並不存在電腦網路視頻通話，因為，根據博彩監察局的規定，在賭場內嚴禁私自裝置任錄影設備，以防外泄賭場運作的畫面，故此，賭場內根本不允許使用電腦網路視頻電話。兩名嫌犯指責輔助人與證人 C 的相關陳述不實，當日，輔助人並沒有要求 C 將籌碼及現金交予兩名嫌犯運送。

證人 J 和 K 表示，Y 貴賓廳沒有使用電腦網路視頻電話，而“老闆”房間內的具體情況，其等則不得而知。

兩名嫌犯指出，按照慣常的作法，涉及大額款項的交付，應以錄音電話的形式留下證據，並且需由交付及收款的經手人簽名。

控方及辯方的證人證言及借據單顯示，行內的慣常作法確實如此。

證人 J、K 則表示，因為輔助人與 Y 貴賓廳老闆之間的熟悉關係，實際上並不需要如此，通常係由工作人員先準備好相關的借款單，再由輔助人過後進行補簽。

輔助人表示，處於對兩名嫌犯的完全信任，不讓兩名嫌犯在經手時簽名。

證人 U 解釋了 Y 貴賓廳支出“碼糧”的一般時間及其運作規範。

證人 W 講述了其他賭廳支出“碼糧”的慣常作法，以及帶 U 到 Y 貴賓廳收取“碼糧”的經過。”

上訴人列出在原審法院已確認的事實中存有多個問題，例如：
1)原審法院沒有區分 D 和 X 貴賓廳為不同的個體；2)根據錄影光碟，於案發當日兩名上訴人並非打算將籌碼運到八樓；3)原審法院錯誤認定 C 為 Y 貴賓廳的負責人；4)CY002326 號借款單僅可證明 D 向 Z 國際借取有關款項；5)質疑 CY002326 號借款單及佣金單屬偽造文件；6)除 CY002326 號借款單外，沒有其他涉及本案之借款單；7)對於運送有關款項的目的，D 的口供前後矛盾；……因此，上訴人認為法院的心證是建基於錯誤的事實而作出，因而原審法院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之明顯錯誤瑕疵。

然而，具體分析相關證據，原審法院除在審判聽證中聽取兩名上訴人的聲明外，還聽取了輔助人的聲明及相關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電話通訊記錄文件及其他書證、扣押物證及其他證據後，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一項信任之濫用罪的事實做出判斷。

經分析上述的證據，雖然兩名上訴人均否認控罪，但是原審法院特別指出：“對於嫌犯聲明、輔助人聲明以及證人證言的部份，合議庭係通過對其等的遣詞用句、身體語言、相互之間的關係、其等與調查事實的關聯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判斷之後，而作出上述之事實認定。”

除了審查相關書證外，原審法院還對兩名上訴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人格及其行為進行分析，從而決定是否採信該等陳述和證言，

並結合一般經驗法則，可合理且顯而易見地得出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實施了犯罪行為並無明顯的、即使是普通人亦可輕易察覺的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5 條第 1 款之規定：“在曾將以口頭向獨任庭或合議庭作出之聲明予以記錄之情況下，如發現有第 400 條第 2 款各項所指之瑕疵，且有理由相信再次調查證據可避免卷宗之移送者，則高等法院容許再次調查證據。”

由於在原審判決中並未發現《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所指之瑕疵，缺乏《刑事訴訟法典》第 415 條所規定的前提條件，不能按照上述條文的規定再次調查證據。

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並沒有上訴人所指的瑕疵，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述理由亦不成立。

3. 上訴人 A 提出原審法院欠缺作出其應作出之調查措施，違反

了調查原則及發現事實真相原則，因而導致《刑事訴訟法典》第 107 條第 2 款 d)項所指的無效提出爭辯。

首先，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 107 條第 2 款 d)項的規定：“偵查或預審不足，且其後未採取可視為對發現事實真相屬必要之措施。”

另外，《刑事訴訟法典》第 107 條第 3 款亦規定：“應按下列時間就以上兩款所指之無效提出爭辯：a)屬有利害關係人在場之行為之無效者，在該行為完結前；b)屬上款 b 項所指之無效者，在就指定聽證日之批示作出通知後五日內；c)屬關於偵查或預審之無效者，在預審辯論完結前；無預審者，在就完結偵查之批示作出通知後五日內；d) 屬特別訴訟形式者，在其聽證開始時。”

故此，對於上述條文規定無效屬取決於爭辯之無效，利害關係人必須在法定期間內對有關無效事宜提出爭辯，否則，有關無效將獲得補正。

根據上述規定，上訴人所提出的問題應該在聽證階段中調查證據結束後即時提出爭辯，又或在原審法院訂定宣判日期批示作出通知後十日內提出爭辯。

因此，上訴人在原審法院宣判後才提出無效的爭辯已屬逾期。

然而，我們亦看看原審法院是否欠缺作出其應作的調查措施。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321 條第 1 款之規定：“法院依職權或

應聲請，命令調查所有其認為為發現事實真相及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而必須審查之證據。”

正如助理檢察長在其意見書中所述：“在調查證據方面法院並不受制於控辯雙方所列舉及提交的證據，相反有依職權進行調查證據的權力及義務。

當然，上述權力及義務僅限於調查那些法院認為對發現事實真相屬必須的證據，而並非對案件無關緊要的證據，目的在於作出公正的裁判，故此法院可以根據第 321 條第 4 款 a) 項的規定駁回對不重要或不必要的證據進行調查的聲請。

值得強調的是，有關證據是否重要應以法院的判斷為標準。”

另一方面，根據原審法院判決事實之判斷所述，經詢問證人 F、G 以及有份參與的證人 N，彼等均聲稱不知道當日有非法賭博。上訴人亦未能提供能識別參與該非法賭博者之身份資料及任何聯絡途徑。

基於上述原因，本案中並無任何跡象存在上訴人所述之非法賭博，原審法院並未違反調查原則及發現事實真相原則。

由於上訴人所指的問題並無出現，因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理由亦不成立。

4. 上訴人提出在賠償金額方面，原審法院沒有讓上訴人行使辯護權，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 74 條第 2 款的規定，原審判決應被宣告無效；在審理案件方面，原審法院判決沒有審理上訴人在答辯狀中所提出的輔助人違反司法保密義務致使證據無效的請求，違反了

《刑事訴訟法典》第 4 條命令適用的《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條第 1 款 d) 項的規定。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74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一、如無依據第 60 條及第 61 條之規定在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中或透過獨立之民事訴訟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則當出現下列情況時，即使有關判決為無罪判決，法官亦須在判決中裁定給予一金額，以彌補所造成之損害：a) 該金額係為合理保護受害人之利益而須裁定者；b) 受害人不反對該金額；及 c) 從審判中得到充分證據，證明依據民法之準則而裁定給予之彌補之前提成立及應裁定給予有關金額。二、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下，就調查證據方面，法官須確保尊重辯論原則。”

換言之，法院在調查證據方面須確保尊重辯論原則。

原審法院判決在賠償方面提到：“根據證明之事實及受害人之意願，兩名嫌犯須對受害人的財產損害承擔賠償責任，賠償金額為港幣 53819640 圓，適時扣減扣押的籌碼以及港幣現金；另加賠償金額由判決確定日起直至完全繳付時之法定利息。”

經綜合分析本案的具體情況，在整個訴訟過程中，輔助人的表現已將其欲獲得彌補之意願表露無遺。

另一方面，上訴人曾向法院申請調查證據，亦曾向法院提交證據，原審法院對其提交的證據進行了調查和審查，由此可見，原審法院並未違反辯論原則。

上訴人所提到的《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條第 1 款 d) 項規定的無效為：“法官未有就其應審理之問題表明立場，或審理其不可審理

之問題。”

首先，上訴人所提出的輔助人在檢察院作出控訴決定前將卷宗內嫌犯姓名、調查內容及進展向外界公開的指控並不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 113 條第 4 款所規定的情況。

另外，在本案中，上訴人在其提交的答辯狀中指出輔助人違反了司法保密義務，就輔助人之行為是否觸犯《刑法典》第 335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並不是原審法院在本案中審理的問題。

因此，上訴人的上述部分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5. 最後，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判決違反了罪疑從無原則。

總結上述第 1 至 4 點，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卷宗內亦不存有可導致無罪釋放上訴人的“合理懷疑”，故此，原審法院未違反上訴人所指的罪疑存無原則。

上訴人 B 的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罪疑從無原則

6. 上訴人 B 提出了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存有明顯錯誤，因而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 項的瑕疵。

就這問題，本院引述本裁判書法律方面第 2 點所載理據，原審法院經綜合分析案中存在的有關證據，包括人證和書證等等，就上訴人提出的文件真偽及涉案金額是否來自“賭底面”等問題進行詳細分析和判斷，最終不採信上訴人一方提出的辯解之辭。

正如檢察院助理檢察長指出：“上訴人所指的文件，如公司商業登記資料及上訴人提交的金沙集團有關 2009 年 2 月 4 日進行的賭博記錄報告，並不能推翻原審法院形成的心證。事實上，金沙集團的報告僅能證明在案發當天 M 確實由 N 替其出面進行電話賭博，並利用上訴人的戶口轉碼，但不能證明存在上訴人提出的‘賭底面’以及涉案款項來自該非法賭博的說辭。”

原審法院分析案件中所載的用作形成其心證的證據材料，從而決定是否採信該等陳述和證言，並結合一般經驗法則，可合理且顯而易見地得出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實施了犯罪行為並無明顯的、即使是普通人亦可輕易察覺的錯誤。

因此，上訴人上述部分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7. 上訴人亦認為原審法院認定的有關輔助人提出的借貸程序與原審法院同樣認定的賭場內部借貸的一般規則不相符，因此，原審法院判決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b) 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 2001 年 3 月 16 日，在第 16/2000 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同樣理解可見於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 III”¹。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認定涉案之款項是借貸及碼糧，又認定行內慣常的作法，涉及大額款項的交付，應以錄音電話的形式留下證據，並且需由交付及收款的經手人簽名。因此，原審判決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本案中，原審法院判決中作出分析說明，雖然其肯定了賭場行內借貸程序的慣常做法，但同時亦根據證人的證言認定由於輔助人與 Y 貴賓廳老闆之間的熟悉關係，輔助人不需跟慣常做法借貸，因此，之間的做法有所不同，兩者之間並無矛盾之處。

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未經法院認定的事實以及作出的

¹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º 2 do art. 410.º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理由說明，上訴人所指的矛盾並不存在。

因此，原審法院在說明理由方面並未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8. 最後，上訴人亦認為原審法院判決違反了罪疑從無原則。

綜合上述第 6 和第 7 點，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原審法院亦未違反上訴人所指的罪疑從無原則。

由於原審法院的判決並沒有兩名上訴人所指的問題，兩名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原審法院判決應予以維持。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 A 及 B 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裁判。

判處兩名上訴人各繳付 8 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並交予兩名上訴人本裁判書副本。

2012年7月26日

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司徒民正 (第一助審法官)

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